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31

富国的伪善

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英〕张夏准/著
(Ha-Joon Cha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31

富国的伪善

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 [英] 张夏准/著
(Ha-Joon Chang)

严 荣/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英] 张夏准
(Chang, H. J.) 著; 严荣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31)
ISBN 978-7-5097-0592-6

I. 富... II. ①张... ②严... III.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IV. 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4253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31

富国的伪善

——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著 者/[英] 张夏准
译 者/严 荣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钟 敏
责任编辑/钟 敏 王晓卿
责任校对/崔冬梅 贾连凤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 65285539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数/21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592-6
著作权合同/图字 01-2008-445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2008年12月，正当我在撰写《富国的伪善》中文版序言之时，世界经济遭遇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如果我说《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

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本书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入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

国自己已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在应对当下的危机时，富国已经采用了我在书中称为“凯恩斯主义为富国所用、货币主义为穷国所用”的原则。它们已经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推行了赤字开支、政府补贴以及对工业和金融业实行国有化等政策。

一些始终在抵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感到些许安慰，比如中国。不过，这是过于冰冷的安慰，因为发展中国家也将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可能比富国的损失还要大。

许多开放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承受了资金突然外流所带来的苦楚，因为这种外流对它们的货币施加了巨大压力。资金外流随之会导致国内资本市场信用枯竭，迫使这些国家的企业面临萎缩，甚至破产倒闭。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蒙受富国进口需求下降所带来的痛苦，这将会导致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依赖原料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则要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富国对原料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一直使用这些原料生产制成品出口到富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缩减，尤其是中国。

虽然更加贫穷、更加缺乏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承受更多压力，但是危机所提出的挑战也将考验中国。尽管中国已经明智地拒绝了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而是循序渐进地融入世界经济，但是过去30年的发展轨迹已经使中国具备了两种结构性的特征，它们所产生的后果会使中国在危机中感受更加强烈。

首先，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是基于成功地进入对富国的出口市场。结果，从规模上看，中国非常依赖出口。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不应该增加出口。我在本书第三章中论证了，为了赚取外汇购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促进出口。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中国现在就会为依赖出口付出代价。由于出口需求下降，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被迫，将需求转移到国内来源上，但是要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实现快速转移，绝非易事。

其次，在过去 30 年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承受着收入不均等的快速增加。中国已经从一个几乎完全均等的社会转变为这样一种状况——一些人生活在模仿白宫的建筑物中，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却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至今，由于增长的步伐非常快，绝大多数人都有所获益，因而收入不均等还没有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可能是几年，经济增长突然放缓将会考验人们对收入不均等的容忍度。在危机来临前，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收入不均等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但是问题能否快速解决，使之在增长减速和岗位减少之时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是不确定的。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对中国的未来我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这场危机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难以保证中国会在危机中毫发无损。但是我希望，对长期生产率增长的承诺和经济决策的实用主义思路，这种在过去 30 年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的有效结合将会使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应对危机。我衷心地期许，对于中国在今后探索更好的危机管理和更健全的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富国的伪善》能有所助益。

张夏准

2008 年 12 月于剑桥

献给爱妻熙贞 (Hee-Jeong)

序 言

莫桑比克的经济奇迹

——如何脱离贫困

莫桑比克接受大企业的挑战

坚果和伏特 (Nuts and Volts)

2061年6月28日，马普托

来自《经济学家》

特立斯·埃斯特拉斯 (Tres Estrelas) 宣布燃料电池技术的一项新突破

6月25日，南非以外非洲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本部在马普托 (Maputo) 的特立斯·埃斯特拉斯，巧妙地安排在国家的独立日宣布一项大规模生产氢燃料电池 (hydrogen fuel cells) 技术的突破。“到我们的新工厂在2063年秋天投产时，”激情四溢的公司主席阿曼多·努马伊奥先生 (Mr. Armando Nhumaio) 宣布，“我们将能接受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大公司的挑战，给消费者提供物超所值的产品。”分析家认为特立斯·埃斯特拉斯的新技术将会取代乙醇作为汽车的主要动力来源。南非西开普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 著名的能源经济研究所的主任纳尔逊·姆贝基-马兰 (Nelson Mbeki-Malan) 说：“这肯定给主要的乙醇燃料生产商提出了严峻挑战，比如巴西的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 和马来西亚的阿科纳斯公司 (Alconas)。”

特立斯·埃斯特拉斯在燃料业务上起点很低。公司在1968年开始出口腰果，这个时间比莫桑比克从葡萄牙获得独立早7年。之后，公司成功地实现了经营多元化，进入了纺织和制糖业，随后大胆地

进入电子产业。一开始公司是作为韩国电子巨头三星的分包商，后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商。但是，2030年有关氢燃料生产将是该公司下一项重要业务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大家都认为我们疯了，”努马伊奥先生说，“燃料部门烧了整整17年钱。幸好，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很多要求获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外部股东。我们坚信，打造一家世界级的企业需要做长时期的准备。”

公司的崛起代表了现代莫桑比克的经济奇迹。1995年，在16年血腥内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莫桑比克的人均收入只有80美元，绝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由于根深蒂固的政治分裂，腐败猖獗，加上33%的识字率，莫桑比克的前景仅仅是从水深火热变成形势严峻。2000年，内战结束后的第八年，莫桑比克人平均每年只能赚到210美元，仅比加纳人平均收入的一半多一些——加纳人能赚到350美元。然而，从那以后，莫桑比克的经济奇迹使它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有着稳定的中上水平收入的国家。如果运气好的话，它也许能在二三十年后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不会在荣誉面前止步，”努马伊奥先生说，他调皮的露齿而笑据说掩藏着果敢的决定，“这是一个技术快速变化的艰难行业。生产周期短，谁都不能指望仅仅靠一种创新就可以维持市场领先者的地位。竞争者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毕竟，他的公司已经震惊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如果特立斯·埃斯特拉斯能从最底端爬升到最上层，也许尼日利亚什么地方一个尚不知名的燃料制造商会想：或许我也能这样做？

莫桑比克或许能也或许不能实现我的幻想。但是如果你在1961年——比莫桑比克的梦想早一个世纪——被告知，韩国将在40年内成为世界上移动电话（当时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你会作何感想？至少目前已经出现了氢燃料电池。

1961年，在结束与朝鲜的兄弟残杀之后的第八年，韩国人的

年收入是每人 82 美元，不到加纳人平均收入（179 美元）的一半。^① 朝鲜战争——开始于 6 月 25 日，凑巧与莫桑比克的独立日是同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战争，在短短三年（1950 ~ 1953 年）内夺去了 400 万人的生命。韩国一半的工业基础和超过 75% 的铁路在这场战争中被摧毁了。虽然韩国展现了一些组织能力，将识字率从 1945 年微不足道的 22%（该水平得自 1910 年以来一直统治韩国的日本殖民者）提高到 1961 年的 71%，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个发展失灵的穷国。1950 年，一份来自美国援助署（USAID）——美国政府当时主要的援助机构——的内部报告称，韩国是个“无底洞”（bottomless pit）。当时，韩国主要出口钨、鱼及其他初级产品。

三星电子公司（Samsung）^② 现在是世界上移动电话、半导体和计算机最主要的出口商之一，它在 1938 年起步，比韩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早 7 年，那时它是一个出口鱼、蔬菜和水果的公司。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它的主要业务仍然是 50 年代中期确立的制糖和纺织。^③ 当它在 1974 年获得韩国半导体公司 50% 的股份进入半导体产业时，没人注意到它。当它 1983 年宣布要设计自己的芯片，向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巨头发起挑战时，很少有人信服。

我在 1963 年 10 月 7 日出生于韩国，当时它是世界上最穷的地

① 韩国的收入数据来自李弘廉《韩国经济史》，韩国首尔，法文社，1999，附录表 1。加纳的数据来自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65，表 1-1。

② 三星在韩语中是“三颗星”的含义，就像我虚构的莫桑比克企业特立斯·埃斯特拉斯一样。我虚构的 2061 年《经济学家》文章中的最后一句是基于该杂志一篇关于三星的真实文章——《尽善尽美？》（2005 年 1 月 13 日），它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如果三星可以从最底端爬升到最上层，也许中国什么地方一个尚不知名的电子制造商会想，或许我也能这样做？”虚构的莫桑比克企业的燃料部门整整亏损了 17 年，这个期限也正是创立于 1960 年的诺基亚电子部门亏损的时间。

③ <http://www.samsung.com/AboutSAMSUNG/SAMSUNGGroup/TimelineHistory/timeline01.htm>

方之一。如今，我是一个富有之国——如果不是最富裕的国家——的公民。在我有生之年，韩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了大约14倍。取得同样的成绩，英国花了两个世纪（从18世纪末到现在），美国花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从19世纪60年代到如今）。^①我在四十多年里所看到的物质进步，相当于一个出生于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退休金领取者，或者一个出生于亚伯拉罕·林肯任总统时期的美国老爷爷，从他们出生到现在所看到的。

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到6岁的房子位于韩国首都首尔的西北角。它是那种很小（两居室）但比较新潮的房子，得益于政府一个利用外国援助修缮破旧住宅区的项目。由于是用水泥砖建造而成，很不保温，因而冬天特别寒冷——韩国冬天的温度会降到零下15度，甚至20度。当然没有抽水马桶，只有非常富有的人家才会有。

然而我家有很多其他人家所没有的奢侈品，这得感谢我的父亲，他是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公务员，利用在哈佛学习一年的机会努力地积攒下了一些奖学金。于是我们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对我们的邻居可是产生了轰动般的影响。我们的一位世交、韩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圣玛丽医院的一位年轻有为的牙医，以前经常挑有重大体育赛事转播的时机来拜访我们——表面上装得跟体育比赛毫无关联。在如今的韩国，他可能会打算把放在卧室里的家里的第二台电视机换成等离子屏幕电视。我的一位堂兄弟刚刚从我父亲的老家光州（Kwangju）搬到首尔，他有一次来看望我们，还因为我们家客厅里奇怪的白色家具而嘲讽了一下我母亲。那是我们的冰箱（厨房太小无法容纳）。我的爱人熙贞（Hee-Jeong）1966年生于光州，她告诉我她家的邻居经常把他们珍贵的食物“存放”在她母亲的冰箱里，就好像她母亲是一家瑞士私人银行的经理，而实际上她母亲是一位成功医生的妻子。

^① 根据麦迪逊的相关数据估计得出。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巴黎，OECD，2003，表1c（英国），表2c（美国）和表5c（韩国）。

一间小的水泥砖房子，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个冰箱，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的父辈却着实是一个梦想，他们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动荡和贫穷中度过的：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分裂成韩国和朝鲜（1948年）以及朝鲜战争。每当我我和我的妹妹延熙（Yonhee）以及我的哥哥夏索（Hasok）抱怨食物时，我母亲总会说我们是如何被宠坏了。她告诉我们，当他们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鸡蛋，他们那一代人就会觉得特别幸福。许多家庭买不起鸡蛋，即便买得起的也得给父亲和工作了的兄长留着。她时常回忆起她的伤心事，她5岁的弟弟在朝鲜战争期间经常挨饿，她说他的手里只有拿着一只饭碗才会感觉好些，哪怕只是一只空碗。就我父亲而言，他是一个喜欢牛排而且胃口特别好的人，朝鲜战争时期正好是一个中学生，不得不靠米饭以及从黑市上的美国军人那儿买来的黄油、酱油和辣椒糊维持生计。在10岁的时候，他无助地看着他7岁的弟弟死于痢疾——一种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如今在韩国已很少听到这种疾病了。

多年以后的2003年，当我从剑桥回来休假并在韩国逗留时，我引着我的朋友和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首尔的国家博物馆游览。我们看到了一场精美的黑白照片展览，这些照片展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人在首尔的中产阶级地区忙乎自己的事务。这正是我对童年的回忆。站在我和约瑟夫之后的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一个尖叫道：“这怎么可能是韩国？这像是越南！”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到20岁，但是对我而言非常熟悉的景象于她却是全然陌生。我转向约瑟夫并告诉他，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我能历经如此的变迁是多么“荣幸”。我感觉像是一名真正见证了黑斯廷斯战役（the Battle of Hastings）的历史学家，或是一名通过时光倒流回到了大爆炸时代的天文学家。

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

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都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毒都要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影响深远的年代——也是很近的年代——韩国的技术状况。

1970年，我开始读小学，那是一个二级私立学校，每个年级有65位学生。我们非常骄傲，因为隔壁的公立学校每个班有90位学生。多年以后，在剑桥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发言者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强行要求削减预算（在那以后削减得更多），使得20世纪80年代非洲一些国家每个教室里的学生数量从平均30多个上升到40多个。这使我突然想起孩童时期韩国学校里的情况有多糟。我读小学时，最豪华的学校一个班有40名学生，然后大家都疑惑：“他们会干些什么？”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区的公立学校扩张到了极限，每个班有100名学生，老师得两班倒，有时要三班倒。在这种条件下，教育多少会有体罚学生并死记硬背教学的情况。这种方法有明显的弊端，但至少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做到了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至少6年的教育。

1972年，当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我学校的操场突然变成了一个士兵营地。他们是为了防止反对戒严法的学生们的任何示威活动，该法是由当时的总统朴正熙（Park Chung-Hee）将军制定的。幸好，他们没有针对我和我的朋友。我们韩国小孩的学术早熟是很出名的，但宪政的确是超出了我们这些9岁小孩的认知范围。我们的小学靠近一所大学，那里造反的学生才是士兵们的目标。事实上，韩国大学生在军人独裁的整个政治黑暗时期是民族的良心，而且他们在1987年将军人独裁推向灭亡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领导角色。

从1961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开始执政以后，朴正熙转变成“平民”并赢得了三次连任。他的选举胜利得益于通过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成功地启动了国家的经济“奇迹”。但是，胜利也同时来自选举

舞弊和政治上的肮脏伎俩。他的第三个也被认定为最后一个总统任期在 1974 年到期，但朴正熙不想就这么下台。到第三个任期的中期，他发动了一次拉美所谓的“自动政变”（auto-coup）。这牵涉到解散议会，建立一个舞弊的选举系统以确保自己在有生之年的总统职位。他的借口是国家无法承受民主的纷扰。人们被告知说，国家必须防御朝鲜，还要加速经济发展。他宣称在 1981 年把韩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到 1000 美元，该目标被认为过于夸张，甚至有点接近妄想。

朴正熙在 1973 年启动了野心勃勃的重化工业化（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alization, HCI）计划。第一个钢铁厂和第一座现代船厂投入生产，第一辆自主设计的汽车（大部分是进口部件）走下了生产线；成立了电子、机械、化工和其他先进产业的新企业。在这段时期，也就是 1972 ~ 1979 年，国家的人均收入根据美元计算，奇迹般地增长了 5 倍多。朴正熙提出的到 1981 年人均收入达到 1000 美元的妄想目标事实上比计划提前四年实现了。出口增长更快，在 1972 ~ 1979 年，韩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加了 9 倍。^①

国家有关经济发展的困局也完全反映在我们的教育中。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国家需要每一点从出口中赚得的外汇去进口机械和其他投入品以发展更好的产业。价值不菲的外汇的确是在国家工厂里打赢出口战争的“工业战士”的血汗。那些把金钱浪费在像非法的外国香烟这样不重要的事情上的人是“卖国贼”。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是当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论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如果大家认为

^① 以现在的美元价计算，韩国在 1972 年的人均收入是 319 美元，1979 年是 1647 美元。1972 年，韩国的总出口是 16 亿美元，到 1979 年增长到 151 亿美元。数据来自 Lee (1999)，附录表 1（收入）和附录表 7（出口）。

这不是犯罪的话。

把外汇花费在任何对工业发展不必要的事上，要么会被禁止，要么通过进口禁令、高关税和消费税（那时称为奢侈品消费税）加以限制。“奢侈品”的类别甚至包括一些相当简单的东西，比如小汽车、威士忌或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出于同样的理由，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结果，尽管有不少亲戚在美国生活，到1986年我23岁去剑桥读研究生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韩国。

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人抽外国香烟或吃被禁止的饼干。相当多的非法和半合法的外国商品在流通。一些是走私品，尤其是来自日本的，但大部分商品是购自——非法或半合法地——韩国的众多美军基地。那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士兵也许依然记得追在他们后面乞要口香糖或巧克力的营养不良的韩国小孩。即便在1970年代的韩国，美国军人的商品仍然被认为是奢侈品。逐渐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可以从商店和流动商贩那儿买到m&m牌的巧克力和果珍。稍不宽裕的人可以去提供“杂烩套餐”（boodae chige）的餐厅，该套餐的字面意义是“军事基地菜肴”（army base stew）。这是韩国经典菜肴“泡菜套餐”（kimchee chige）的一种实惠版，虽然有“泡菜”（就是在大蒜和辣椒中腌泡的大白菜），但用更便宜的肉代替其他重要的调料和猪肉，比如从美军基地走私来的剩余的熏肉、香肠和火腿肉。

我渴望有机会能从美军的“C口粮”（C Ration）（作战时的罐头和干粮）盒里获得一听火腿肉、咸牛肉、巧克力、饼干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那时连名字也不知道的东西。我母亲的一个叔叔，那时是韩国军队里的一位将军，过去经常利用与美军联合军演的机会积攒这些供应品，然后作为盛宴送给我。美国士兵咒骂他们战时口粮的糟糕质量。而对我来说，它们简直就像是弗腾梅森（Fortnum & Mason）令人愉悦的食物篮。但那时我是生活在一个连香草冰淇淋都

少得可怜的国家，以至于在中学念英语之前，我一直都认为“香草”的意思是“不受人喜欢”。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较富裕的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你可以想象得到其他小孩的境况。

去上中学时，父亲送给我一个卡西欧电子计算器，这件礼物可是超出了我最大胆的梦想。那时它可能值一个制衣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即便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他对我们教育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20多年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韩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计算器随处可见，以至于百货商场将其作为礼品免费派送，很多最后都成为小孩的玩具（不，我不认为这是韩国小孩精于算术的原因！）。

当然，韩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没有黑暗面的。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房”（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

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

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鹿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尔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岛上现在有一座超现代的环境友好型的沼气发电站，它引入填埋在那儿的有机物质）。

1979年10月，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朴正熙意外地被他的情报部长刺杀了，当时百姓对他的独裁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混乱非常不满。紧接着是短暂的“首尔之春”（Spring of Seoul），看到了民主兴起的希望。但是，它被全斗焕（Chun Doo-Hwan）的又一个军事政府给残酷地终结了，全斗焕在1980年5月的光州屠杀中（the Kwangju Massacre）镇压了长达两周的武装民众反抗，在这之后他开始执政。

虽然出现了这次重大的政治挫折，到1980年代初，韩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厄瓜多尔、毛里求斯及哥斯达黎加相当。但这与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繁荣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那时在我们高中生中，表达共同感受的一首歌曲是《我必须去香港》，它的意思是“我有了走出这个世界的经验”。虽然今天的香港仍然比韩国富裕，但当时那种感受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香港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三四倍之多。

当我1982年上大学时，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时这个问题比现在讨论得还激烈。那时，韩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复制先进的产品，百姓也足够宽裕，能够追求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音乐、流行商品、书籍）。但是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拿出原创的产品，没有能力发展和拥有国际专利及自己的版权和商标。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第五位。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